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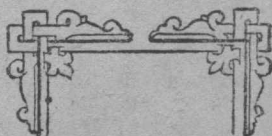
蘇聯之行

高士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一九四六



郭沫若著

蘇聯紀行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前

記

五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蘇聯大使館的費德林博士來訪，他遞給我一封信，是蘇聯科學院邀我去參加第二百二十週年的紀念大會。會將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兩地聯續舉行，自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會期半個月。各國的學者除掉法西斯國家之外都受了邀請，我國有兩位，除我之外，另一位是丁燮林先生。

這自然是很光榮的事體，多年的宿望得到了這樣意外的滿足。朋友們都替我慶賀，開會歡送，設宴餞別，整整繁忙了十天。特別是立羣，她快要爲我忙壞了。拖着幼小的三子一女（頂大的漢英才六歲，庶英五歲，世英四歲，民英兩歲），還要爲我整備行裝，並奔走其它的事務。

六月九日乘美國軍用機離渝，道經印度、伊蘭，飛往蘇京。滿以爲在十六日以前一定可以趕到，但不料在路上就攔太大，一直到二十五日才到了莫斯科。慶祝大會已經移到列寧格勒去了。我雖然在二十六日晚上也飛到了列寧格勒，算只僅僅趕上了大會的閉幕。好些貴重的學術報告不曾聽到，並且失掉了在大會上正式表示慶祝的機會，實在是美中不足的一件憾事。

同被邀請的丁先生比我得更遲，他是六月二十九日才到莫斯科的。我們彼此談笑話，說我們都是落伍者，幕外人。這自嘲實在有說不出的辛辣味。中國的科學落後，仰仗別人的交通工具往來，就

是做客也做不過別人的冠冕呵。

但我自己算好，在蘇聯受了特別的優待。我曾經飛到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中央亞細亞的塔什干、撒馬爾罕，又遊覽過託爾斯泰的故居雅斯拿雅、坡里雅拿。參觀了好些研究所、博物館、工場、集體農場、大學校、中學校、幼稚園、欣賞了話劇、歌劇、木偶劇、音樂、跳舞、繪畫；把晤過好些工人、農人、學者、作家、藝術家、工程師。在蘇聯足足滯留了五十天。時期雖然並不算長，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五十年的人還要多。

我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經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蘇聯去的，有了這樣好的機會，應該多學了一些東西回來，但我却同樣抱憾。蘇聯值得學習的東西太多了，時期畢竟太短。自己的準備也太不夠，尤其是言語不通，要全靠朋友翻譯，耳朵又聾，連譯辭也聽不完備。我真有點『如入寶山空手回』的形像。十分抱歉，把朋友們的期待辜負了，尤其是蘇聯人民的厚誼。

朋友們很關切，在種種場合要我作報告，我作過了，而且翻來覆去地作過了。朋友們不能滿足——事實上是我不能使他們滿足，還望我寫些東西出來。大約以爲我還有什麼好的資料保留着的吧。我現在率性把我這幾十天的日記傾箱倒篋地整理出來，作爲芹獻。但要告罪在先，假如不合胃口，依然不能滿足，不要以爲蘇聯就只是這樣或只有這麼一點點東西。

日

記

六月九日

天氣熱不可耐，昨晚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醒來的時候還不到四點鐘，趁着立羣和孩子們還在睡，率性把積下的字債還清了，一共寫了四十二張。

吃早飯的時候，世英問我：『爹爹，你到蘇聯去，好久回來？』我回答不出，眼淚有點溼溼。

自己的心境是在哀樂之間。能夠到蘇聯，自然是多年的宿願，但把年青的立羣和幼小的兒女留在重慶，於心實在難忍。假使可能的話，我想在國外久住，或者率性往英美去遊歷一番。究竟什麼時候回來呢？實在回答不出。

發現洗臉時所常用的一面鏡子被用人打破了，心裡很不愉快。爲什麼不早不遲，獨於在今天我要動身的時候，鏡子要被打破呢？儘管說那是迷信，心裡總有點暗然。

送行的朋友不斷的來，有帶照像機來的，也照了好幾張像。

立羣說我的頭髮太長，應該趕着去理一次髮，九點半鐘的時候，我在忙亂中把漢英一同帶了出去，在附近一家極簡陋的小理髮店裡把頭髮剪了。漢英，我們是打算讓他到飛機場去送行的。回家的

路上，我不免有幾分淒涼地告訴他：

——漢英，你要大些。爹爹走了，你要好生聽媽媽的話，不要和弟弟妹妹們一同懊氣。

他默默地在在我旁邊走着，沒有咋聲。他似乎已約略知道了一些別離的滋味。

十一點五十分的時候，同朋友們一道用中飯。送行的人太多，只好輪流着立食。

剛好把晚飯吃完，蘇聯大使館的汽車來了。立羣叫人們把小孩子們帶開了，免得他們啼哭，連漢英她都臨時改變了計劃，叫他去睡午覺，不讓他到飛機場去了。

朋友們送我到市民醫院門口，握手告別了。只有少數的人，分乘着兩部汽車，向枇杷山駛去。

天氣熱得難耐，到了大使館的時候，安南略先生接待着我們，開了幾瓶香檳酒以壯行色。飛機是兩點鐘起飛，時間已經迫促，沒有多作逗留，便趕着動身。米克拉雪夫斯基參事也趕來了，他本打算到飛機場的，但因中暑，有些熱候，便中止了。

安先生，蘇牧先生，立羣，我，同坐上一部汽車。要回國述職的邵魯諾夫先生，他同行李另外坐着一部，由枇杷山出發，經由兩浮支路，駛向九龍坡的飛機場。

九龍坡離城十二公里，飛機場臨着長江，並不甚大。這兒立羣和我都是第一次來。飛機場是一層的建築，背着江面，周圍有些洋槐圍繞着。站內進門處一左一右有兩個櫃台間，左手是美國人辦公的地方，右手的是中國人。一進站，先在右手間投到，據執事的人說：中國人出境還要有外事局的許可

證，不然便不能起飛。這一消息出乎意外。因為時間太迫促了，還要回城辦許可證，萬萬來不及。外事局照別國的慣例應該是管理外國人出境的事情，今天剛剛相反。打電話進城去一時得不到着落，安先生又連忙派了一部汽車回城，請大使館就近辦理，我們便坐在站裡等候回信。

費德林博士趕來了。製片廠的司徒慧敏兄和另外的幾位攝影同志也趕來了。等到快要兩點鐘了，許可證還沒有消息。執事的人來催問，假使得不到許可證，要到美國人那邊把乘機證取消。我心裡爲這事反而有點高興：今天能夠不走，率性走不成，倒更好。人事是盡了的。外交部發了護照，美軍司令部也特別優待，沒想出還有這麼一道難關。

然而碰巧，飛機遲了刻。不僅二時沒有到，就是三時，三時半，都沒有到，而許可證也同飛機的遲到在比賽，遲遲地得不到最後的着落。時間沉悶地過着，熱，汗，電扇鼓着溫風。

快要到四點鐘了，對山有號角的聲音，報告飛機到站。那就是我們所等待的飛機。乘機的人都在作準備了。許可證還沒有送到。執事的中國人又來說，要去取消乘機證了。但就在這時候，右手內部的辦公室裏面又有人出來，說是接到城裡的電話許可乘機。這一來，我好像得了赦令，但又好像受到了判決，無論如何非走不可了。我有點茫然。立羣爲我倒了一杯涼水來讓我喝，又把手巾蘸濕讓我抹了一次臉。送行者的姓名都被調查了，我們便動身走出機站。立羣只向我說了一句話：到那邊去少喝些酒啊。我現心裡發了誓，絕對要記住她的叮囑。

在一架中型的運輸機下和大家握別，攝影的朋友們不斷地攝影。當我和立羣握別的時候，費博士很愉快地說：假使在我們蘇聯，是要來這一套的。他把兩手比成擁抱的形式。但我們沒有擁抱。

上了飛機。立羣在下面對我說：他們還要我們演一個場面。慧敏兄導演着，要我從飛機上和立羣握手。管飛機門的一位美國青年，含着笑，閃開了。攝影完畢，碰的一聲，鐵門關上了。

飛機的座位在兩旁的窗下，可以坐三四十人光景，但乘機的人只有九個人，座位兩旁有繫腰的板帶，要起飛了，機師叫把板帶鉗上以免震蕩。待飛到了上空，又叫把板帶解鉗。後來在下降的時候也這樣，對於旅客的便利，注意得相當周到。

坐在飛機上起初也還是有點茫然，待一飛定了，在上空發生着清涼的感觸，腦子裡的回憶就像突然開了閘的一樣，湧了上來。

八年的抗戰當中，自己所曾參與過的差不多每一個場面都交錯地迅速地掙換着，但一想到前途便突然現出一片白光。計自四點二十分起飛，七點二十分到達昆明，在空中足足飛了三個鐘頭，腦子裡的回憶也湧了三個鐘頭。

昆明的飛機場很大，不斷的有飛機起飛或降落；有大風，只見塵砂濛濛。天氣倒很涼快，有點像重慶的晚秋。飛機場很簡陋，牆是土磚砌成，屋頂有些漏洞。來去都是美國的士兵，人數很多。在

站上辦好了手續，要明天午後四時才能繼續航程，當晚便落宿在飛機場內的美軍招待所。那是臨時性的白落庫（Barracks），每間屋子裡面對放着四尊床，在屋底靠窗一張長條桌。我們落宿的一間已經先有兩位美國兵住着，正在光着身子在電燈下納涼，看見我們進門，他們把衣服穿好出去了。

浴室裡面只有漏篷設備，沖浴了一次，同邵君往食堂進餐。定食，很簡單，但很豐富。咖啡盛以龐大的乳白玻璃盅，可以任人牛飲，這却需要相當粗大的神經。

一切都是美國式，雖感方便，但亦頗覺生疏。很想到昆明市上去看看，聽說還有十來公里，沒有交通工具，也就只好作罷。

未出中國境便已經成爲一個外國人了。

六 月 十 日

晨六時起床——時間還是重慶的戰時時間，應該還只五時。太早，其它的人都還沒有什麼動靜。到盥洗室裡去洗了臉，回到居室時，發覺手錶還放在盥洗室裡，連忙回頭去找尋，手錶就不見了。一位老公役，中國人，在那兒打掃。我疑心是他拾去了，但也不好詰問。他看見我的情形，很安閑地問我：是不是在找錶？我答應了他，他從衣包裡取出了錶來還我，神色愈是安泰。我起了肅敬的念頭。盥洗室裡面有禁制：『用水有毒，不能進口』。有一個大水囊掛着，我知道是漱口用的，腳有幾個

水栓，但不知道怎麼開。我在這時才請教那老公役，他把兩個指頭套上水栓的兩翼，用拇指把挺出的活塞向內壓，水便從水栓下的一個小孔裡面流出了。我非常感謝。今天真是吉利，一清早便遇着這樣的大好事。

昨晚睡得不甚好。天氣涼，我蓋上了毛氈，本很暖和，但不知道怎的，兩腳的魚肚筋老是抽筋。在食堂裡用了早飯，請食堂中的一位中國僕歐引路，我們到達了公路，在那兒搭上了美國軍部的交通卡車，便往昆明城裡去。公路兩旁的風景樹很茂盛，樹葉肥厚，有點亞熱帶樹的風味，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乘十餘公里達到城區，街道却很凌亂猥雜，蒼蠅垃圾乞丐觸目皆是。吉普車穿梭式來往，看起來美國兵好像比昆明市還要多——當然這只是我的錯覺。實際是遍街都是閑人，和重慶市頭並沒有兩樣。想像中的昆明是要更美麗些的，我有點失望了。

昆明朋友們的住處，我一個也不記得。開始想到正義街去訪一位報館裡的朋友，但想在清早，過記者生活的人恐怕還沒有起床。在街頭看見有『聯大工學院合作社』的招牌，走進去探問聞一多吳晗諸位先生的住址，知道他們住在城外，路太遠，而且又是星期，不一定在家。沒有辦法，只好在街頭流浪。

街上有黃包車，車夫的雲南話却不大好懂。我問他們昆明有沒有中蘇文化協會，我們也很茫然。我改變了計劃，向街頭過路的學生樣的青年問，這一問却立地收到成功。一位操廣東音的青年告訴我：

在拓東路勝利橋側臨江里。他叫我們回頭走，走不好遠的那座橋就是勝利橋，過橋倒左手，沿着城壕的那一帶就是臨江里了。我們照着路向走，果然找到了一家門戶，有綠色油漆的鐵柵門，懸着『中蘇文化協會』的長牌。

秘書楊須知先生和其它五六人正在樓下的會議室裡面準備開座談會，要討論關於蘇聯的什麼。我他本來是不認識的，但一說明便都成了熟朋友，受着很懇切的招待。我打算會田漢、光未然，開一多、吳晗諸位先生，一位朋友乘着自動車便去分頭通知去了。邵先生參加了座談會，我却坐在一邊把清早沒寫完的一封信又拿出來寫，想趕着付郵寄給立羣。

我手裡只有一節長不滿一寸的斷鉛筆，還是今天清早在寢室裡的長桌上拾得的。

——你沒有鋼筆嗎？一位朋友問我。

——有是有的，被人抽去了。這兒又引起了我一段新鮮的回憶。

是六號的晚上，文工會的舊友們在我家裡，開過一次小規模的餞別茶會。並不怎麼寬的書房裡，坐了四十來往個人。我掛在壁上的上衣插着鋼筆，第二清早才發現不翼而飛了。大約是誰取下來記錄，忘記了插回原處的吧。

那隻鋼筆在我是很值得紀念的，那是墨色有黃環帶的一隻頭號派克。前幾年寫史劇『屈原』的時候，寫得太快，把筆尖觸斷了。費德林博士也有一隻同樣的筆，他便送了我。斷了的筆尖，後來修理

好了。同樣的筆我便有了兩隻，因此筆套頭便每每混用。然而區別畢竟是有的，費博士贈我的一隻筆桿上刻有一個『費』字，我自己的一隻筆套頭上的塞子是掉了的。結果遺失了的是我的筆桿，費的筆套，留下的是我的筆套，費的筆桿。這樣值得紀念的東西，我不願意它再遺失，便留在家裡讓立羣使用，我是打算到了加爾各答買一隻新的。

楊秘書把自己的鋼筆借給我，我把信寫完了，便託他用航快寄出。

光未然來了。太不湊巧，聽說田漢下鄉去演講去了。本來在中午是有一次聚餐的，寄寓昆明的前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朋友們要作一次會合，就因為田先生有講演，趕不回來，改到晚上去了。

乘自轉車的朋友也回來了，接着是聞一多和吳晗兩位先生。多年不見了，意外的會合使得大家都興奮，又因時間短促，更覺得珍惜。大家都希望我能夠再留一天，邵先生也有這個意思，我倒很想早走，希望能夠去趕上科學院的開會。這只好等飛機來決定了，假使午後四時沒有飛機，我們就斷然留下。

在冠在園一同吃了一頓中飯。把飯吃完之後，已經是兩點鐘了。王晉笙趕了來，很有點不自然的樣子。他一見到我便提到「孔雀膽」的上演稅。「孔雀膽」去年十一月在昆明上演，收入在一千六百萬元以上，照百分之三的比例，應該付我至少四十萬元的演稅。但他一直拖欠着。他說了一些抱歉的

話，又說要利上加利的付還，決不失信。我自然也感謝了他。（不過在我整理日記的今天，上演稅還是沒有消息。）

是上飛機的時候了，大家要一同去，却没有方便的汽車。在這兒晉笙費了氣力，他去找了一部很古式的大轎車來，坐上了十幾個人。到了飛機場的時候，四點鐘確是有飛機，便只好同大家告別。

飛機是五點鐘起飛的，機型較大，坐滿了美國的士兵，一共有五十來個人，飛得很高，甚爲平穩，曾用養氣口罩一次，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只是冷得有時不能支持，我把隨身帶着的毛氈裹上了。約略飛了兩個鐘頭的光景，在密支那降落，乘客們通下機用晚飯。熱意如蒸，完全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一個鐘頭之後又繼續飛行，又曾用養氣罩一次。飛機的人多裹上毛氈，在機底上和衣而臥。將近十二時，到了加爾各答。邵先生的行李很多，而且都很大而且重，在機場上逗留了很久。一位彪形大漢，面孔有點像鬥牛狗一樣的英國警吏緊緊跟隨着我們。把行李捆上一部吉普車，在街道上跑了很長的時間。雖然已是深夜，但街道兩旁時有牛車往還，有不少的印度人在露天中過夜。跑了半小時光景，車子駛進了一座大建築的前庭，停住了。我以爲是旅館，進去之後才知道是稅關。還不是辦公的時候，彪形大漢叫我們等候。到了一點過鐘才開始檢查，彪形大漢的那雙眼睛，鼓得像兩盞頭燈。邵先生是外交官，他的行李是不受檢查的，我的兩口皮箱便受了澈底的光顧。算好，我自己並不是違禁

的人，也並沒有攜帶什麼違禁的物品，雖然麻煩了將近一個鐘頭，算也通過了。

行李檢查完畢之後，本該出關了，但找不到旅館。邵先生和我都是初次來印度，毫無經驗，便只好坐在稅關裡面過了一夜。

六月十一日

宏大的稅關在半夜經過了一番忙亂的檢查之後，稅警們都散了，只剩下煌煌的電燈照着幾圓屋頂電風扇在那兒焦燥地旋轉。幾位印度僕歐，就像燒焦了的幾架死屍一樣在水門汀的地面上陳睡着。

六點鐘的時候，有一位紅頭巡捕進來，把僕歐們蹴醒了，有幾個拿了一種特殊的掃帚來拖地。那是用繩子綁的一大簇的植物纖維（似乎是麻），有四尺長的光景，沒有把柄，只是用繩子拖。用起來好像很不方便，但看他們悠閑地拖來拖去，似乎也不十分費力地把地面拖乾淨了。

我走出庭前去看一下，看見了那兒的街名是滑鐵爐路（Watesloo Road）。街沿上也還睡着好些印度人。不少的灰頸烏鴉在街上爭吃死老鼠。

七點鐘的時候，邵先生和蘇聯商務代辦處通了電話，不一會有一位蘇聯朋友坐汽車來照拂我們。原來那稅關的樓上便是一家大旅社，是有樓門可通的。我們被引向右手的樓門，但還鎖着，只得又退回來，坐着汽車，轉了一個街角，便到了旅舍的門口，是 Great Eastern Hotel（大東旅舍）。

旅舍的客房聽說已經住滿，在一八七號房裡已經住了三個人了，臨時又安上兩尊行軍床，勉強住下。在食堂裏用了早飯，將近十點鐘的時候，商務代辦葉爾辛先生來訪，有五十上下的年紀，人很精幹。他立刻帶領我們到普列安里亞街去辦登記手續。因為稅關警吏在我的護照上蓋了一個鈴記，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在外人登記處去登記。

登記處把中國人和別的外國人是分開來了，管理中國人登記的也是一位中國人，但他却不說中國話而說英國話。這位先生算對於我特別客氣，沒有什麼刁難，給了我一張登記證，限於十五日內離境。這些限制不知道是什麼用意。在限制者或許會覺得這十五日的期限夠長，但在我自己倒也並不覺得這個期限的太短。假如當天便能夠起飛，我倒是一心香禱祝的。

登記手續辦完之後，隨着葉爾辛先生到他的代辦處去坐了一下，一個大廳的正中有幾位男女職員在那兒學習英文。葉代辦很忙，他另外派了一位年青的朋友陪伴我們到美軍飛機場去打聽飛機的消息。

熱帶性的陽光很強烈，加以昨夜未睡，兩眼的結膜發炎，頗感覺不舒服。

市街建築相當講究，愛用紫紅色，表示着印度的地方色彩。交通工具應有盡有。也有人力車，比中國境內的要大些。每每看見兩個美國大兵同坐在一部人力車上，意氣揚揚然。拉車的印度人，個子都很小，裸着黑得放光的身子，弓着背在前面拉，一面跑，一面拍着右側車柄的鈴子，響出一種特殊

的韻律。運搬貨物多用牛車，用兩條牛拖，黃牛多白色，也有水牛，但角作畸形，總覺得有點異樣，街頭巷尾每見純粹印度人的小店，席地而坐，和日本人的風俗頗相類似，

飛機聽說要後天才有，但因邵先生的行李過多，照所規定的重量六十八磅超過了幾倍，要向重慶總部請示，到了後天再去討回話。

午後一時頃回到旅舍，以濕手巾蒙目，午睡移時，補足了昨晚的睡眠，眼膜的發炎漸漸好些了。

六月十二日

正是吃芒果的時節。芒果將近二十年不吃了，甚有風味。

早飯後，隨邵秘書出外購物，價昂物劣，一樣呈現着戰時狀況。想買一枝自來水筆，四處找尋不可得。在一家商店中遇見兩位中國青年，覺得很親切，我便和他們打招呼。彼此本不相識，但國外相逢，儼如舊友。一位K君，在遠征軍部服務，據說明日將返八莫，再經由昆明回重慶，大概月底可望到達。一位Y君，是要到倫敦去的，在等飛機。我告訴他們想買自來水筆，他們說只有黑市才可以買到，中國街有賣的。我到這時才知道加市還有中國街（China Town）。我要求兩位同道去訪問中國街，他們答應了，邵秘書不願去，便只好暫時告別。

三人坐黃包車到了中國街。街道狹，房屋矮小，一切情形儼如像在中國。在一家姓秦的雜貨店裡

面買了一對新型的派克筆，一隻鋼筆，一隻鉛筆，去錢三百一十盧比，折合美金一百零三元。

中國街有一家中國菜館，是西式三層樓的建築，K君約去用中國飯，館內陳設也多是中國式。無心中遇着了他們二位算多少知道了一些印度和加市的情形。聽說在軍事吃緊的時候。遠征軍很受歡迎，現在日本人打退了，遠征軍全部快要撤退回國了，印度的英國當局顯示着有意於送客的意思。又聽說外國兵不許進中國街，不然中國菜館的生意定然要應接不暇。當時見着遠征軍士一羣的窮苦。同是目況漸就恢復，傍晚邵先生回寓時，購物頗多，以一沉香匣見示，雕鏤頗爲工緻。

六月十三日

早飯後與邵秘書同到美國軍部，乘機事尚無着落。據說電重慶總部尚無回電，午後二三時頃可再往探聽消息。我開始感覺着焦燥。

同往新市場 (New Market)，是印度人開的各色各樣的小商店的總匯。純粹印度式的水瓶很有美術風味，但不多見。街頭充塞者仍是洋貨。純粹的印度貨以手工品爲多，象牙雕刻，沉香匣，添花皮篋，觸目皆是。

水果頗多，鳳梨、香蕉、芒果、荔枝、桂元、類似羊桃的小果。花類亦多，蓮花、晚香玉、茉莉，還有一些不知名的奇花異卉。